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辅导材料

一九八一年七月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唐 培 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的第一部分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为什么在学习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需要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

《决议》原先没有这一部分，而是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决议》时，陈云同志提出《决议》开头要总起来写二十八年的历史。小平同志同意这个意见。所以后来加上了这一部分概述，就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自己领会，感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先回顾一下二十八年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亦即不要割断历史来看问题。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昨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今天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是党领导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同志是在民主革命时就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建国前二十八年中产生、成熟、形成体系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要真正懂得建国以来党的三十二年历史，就必须首先了解建国以前党的二十八年历史，这就叫做了解历史的全过程。二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错误，在全面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有一种全面否定的倾向。我们党内也有所反映，在四千人讨论《决议》当中反映出这样的现象。因而回顾一下二十八

年的历史，有它现实的必要性。这次起草《决议》指导思想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怎样才能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地位呢？如果仅仅写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很难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由此可见，从理论和现实情况看，我们回顾党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庆祝党的六十周年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大家对昨天的中国不是懂得太多了，而是懂得太少了。”

当前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可从下列三个方面进行学习：

1、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真理；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2、吸取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经验，为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利条件。

3、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革命的理论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的风格即是有自觉纪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下面就二十八年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觉得二十八年时间又长，内容又多，又都比较熟悉，不好介绍，究竟怎么来介绍，市委宣传部提出介绍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党、毛泽东同志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使革命转危为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的。我根据这一要求给大家做个介绍。

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中，曾出现过许多危急的、严重的、复杂的形势，在这些关键时刻，党依靠了自身的力量，依靠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了坚定而正确的措施，使党和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并由胜利走向胜利。现按历史顺序，

选择八个问题作概略介绍。

一、党的创立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1、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它们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控制海关；把中国变为倾销其商品的广大市场和榨取廉价劳动力、掠夺原料的重要基地；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2、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大肆压榨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下，为争夺地盘，连年军阀混战，使国家处于四分五裂、贫困落后的境地。

3、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

4、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中国的先进人物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继，历尽艰险，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也没有找到中国的光明出路。当时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学习西方，提出了种种主张，什么工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但是这些都没有使中国兴盛起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正如毛泽东同志很生动地说过：我们向西方学习，但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中国人民反抗的失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也即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是没有先进思想作指导，也即没有马列主义作指导。

旧中国人民好似在茫茫苦海、沉沉黑夜中，找不到出路。

5、正当中国处在迷雾重重的黑暗时刻，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她是中国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一成立即宣告以马列主义作指导，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党的“二大”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从一八四〇年至一九二二年，我国历次的反抗斗争和革命运动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即使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也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二、党领导和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

1、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早日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投入实际斗争，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于党的有效活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北洋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发生“二七”惨案，工运转入低潮。党总结经验，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取得斗争胜利。

2、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召开了“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一九二四年一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共产国际的帮助，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3、党领导了人民加速了革命步伐。在国共合作后，党恢复了工人运

动，开展了农民运动，并同国民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一九二五年，以上海“五卅”运动为起点，揭开了革命大风暴的序幕，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省港大罢工爆发，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群众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国民革命军迅速地统一了广东全省，巩固了革命根据地。这一切为北伐战争作好准备。

4、在革命斗争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右派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加紧篡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主张予以反击，但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经过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中山舰事件”和五月“整理党务案”，蒋介石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为其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好准备。

5、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党积极推动北伐战争，广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在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党领导了汉口、九江的工人收回了租界，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毛泽东领导以湖南为中心的湘鄂粤的农民运动猛烈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基本上被摧毁，北伐战争继续胜利发展。

6、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由于党正处在幼年，缺少必要的经验，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次大革命最后遭到了失败。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公、善于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涌现出一批比较成熟的领袖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彭湃、恽代英、张太雷、向警予等同志。以毛泽东为代表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试图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论述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

三、党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一)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

1、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组成反革命联合阵线，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大摧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得到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支持，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2、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冷冷清清，革命转入低潮。

3、党遭到突然袭击损失惨重，各级党组织大部分被打散，党员由六万多人骤减剩一万人，党所领导的工、农、妇、青等群众组织也基本上被破坏。党员中间也发生了分化，最坏的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反动派，谋求升官发财；有的登报声明，自动脱党、退党；有的不告而别，一走了事；有的另组政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还有陈独秀、彭述之等与托洛茨基分子组成“陈托取消派”，反对党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从这些情况来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也有个信仰危机问题，对中国革命能不能继续下去，对马列主义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发生了怀疑。当时摆在党面前的最重大的问题是要不要继续革命和如何革命的问题。在这革命的严重关头，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同志高举起了继续革命大旗，用武装反对国民党，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是最好的概括和说明。

(二) 党采取继续革命的坚定措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七月十二日党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检讨，成立临时中央常委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决定举行南

昌起义来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

2、八月一日，根据党的决定，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3、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今后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北方局，分别派遣罗亦农、张太雷、王荷波、蔡和森赴各局工作。

八七会议在挽救革命失败中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亦就是说解决了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至于武装起义后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亦即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三）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1、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到一九二八年底，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大多数失败了，但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敌人以打击，并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一批武装起义在革命斗争中总结了经验，先后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2、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十月即在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同月的起义，还有杨善集领导的琼崖起义，遭到严重挫折，杨善集等领导同志牺牲；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坚持到二八年底也失败了）。正如《决议》上所指出：“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3、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对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都作了认真的总结，不仅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而且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选集》中《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即比较完整地阐明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解决了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新贡献。

其他革命根据地虽然坚持了斗争并有一定的发展，可是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红色政权理论和政策。

4、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同志以井冈山为依托，继续开拓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反革命“围剿”，使上述两块根据地扩大而连接起来，从而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近十万。一九三一年在中央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不久党中央亦迁移至此，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认真总结经验，初步形成了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作战的战略战术。周恩来在任中央军委书记期间曾把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向各根据地作过介绍。如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党中央给四川、福建等省委的信中提到：“朱毛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到处都与广大群众的斗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指出：“要深刻地应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到这些新编的红军中去使之日趋健壮与发展”。

在党的领导下，到一九三四年全国建立了十二块根据地，遍布十二个省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革命形势又大大发展起来了。贡献最大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朱德。《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

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我们讲党史时，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偏向。过去往往只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坚持斗争一笔带过，或者就根本不提，甚至把其他革命根据地都说成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指导、影响下产生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在前一个时期，往往强调了另一个方面，强调各个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多地和过份地指责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毛泽东创建这条革命道路的重大贡献没有足够的评价，这同样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四、遵义会议的召开，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一）遵义会议前夕的严重形势

1、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领导地位后，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丧失了，第五次反“围剿”也失败了，第一方面红军不得不被迫进行长征，其他根据地和红军有的被迫撤退、有的根据中央命令开始长征、有的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而转移，十几个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块，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三万，三十万党员锐减到四万左右，白区工作极大部分受到损失，中国革命再次面临严重危急的关头。

2、当时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渡过湘江，折向湘南，准备北上湘西和贺龙、肖克所部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这一意图为国民党所掌握，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军队在湘西布防设伏，企图围歼我军。如果按照“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部署，三万红军一入湘西，立即陷入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如不及时扭转这个危急局势的话，可以说，就将发生一场比皖南事变严重得多的历史惨案，中央红军很可能遭到全军覆没。

（二）遵义会议召开的条件成熟

一九三五年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条件日趋成熟，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广大的指战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实践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比之后，提高了认识。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我想举一个例子，李维汉同志回忆说，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议一下去，他立即表示同意。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呢？这有他的思想基础。他讲得很具体，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感觉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一是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同志，要他扩大红军三万人，并说如果能扩大红军三万人，我们的第五次反围剿就能取得胜利，结果李维汉同志扩大了红军五万人，超额完成任务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这在李维汉脑子里打个问号，扩大三万人就能胜利，为什么我扩大五万人还失败呢？第二，李维汉同志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听两个领导同志讲，上海完了。所谓上海完了，就是上海的组织给破坏掉了。李维汉同志也是长期搞过白区工作的，他想，过去上海的工作都没垮掉，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垮掉了呢？第三，原来红军长征想在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在长征的过程中出现惊慌失措情绪，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在退却时的逃跑主义。没有目的地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这又在李维汉脑子里打了个问号。他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多次对比，已经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一出来，他立刻同意。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转折，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识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夕作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一些同志转变认识，特别对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都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的重要的领导同志。王稼祥同志有个回忆：“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说明经过毛泽东做了工作，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转变了认识，他们一致感到必须召开中央会议，纠

正“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就提出来正确的主张，也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挽救革命。这主要表现在三次会议上。一次是通道会议，一次是黎平会议，一次是猴场会议，这都是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召开的。第一次通道会议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的，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要向湘西发展，这次通道会议，毛泽东力图向敌人的薄弱地方发展，反对向湘西发展。向湘西去呢，正好投入到敌人的包围之中。应该避实就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多数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不住湘西发展，向贵州发展。所以，通道会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仅仅这一次会议，就把左倾思想转变过来了。虽然说决定向贵州发展，左倾机会主义者仍想去湘西。所以不得不在十二月十八日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中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是不可能了”，“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这可以说是通道会议的继续。接下去，就是猴场会议，已经到了一九三五年的一月一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军应该渡乌江开赴遵义。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渡乌江，仍然企图向东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猴场会议最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三次会议实际上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逐步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通过这几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我们党，自己挺身而出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使得大多数同志能够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讨论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到了遵义以后，这个地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左倾机会主义者想在这里休整一下。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就抓住这个休整的机会，力争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这样，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

（三）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开会时间尚没有确切的材料加以肯定，大致是一月上旬或中旬，会议开了五天左右。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个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再加上有关方面同志的参加。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一张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同志们要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集中讨论中央的军事路线问题。首先，博古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军事路线和五次反“围剿”的正报告，其次周恩来作副报告，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的一些情况。接着，毛泽东同志作了长篇发言，具体分析他们的错误，王稼祥、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发言，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家知道遵义会议斗争很激烈，激烈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博古等为他们错误辩护，很多同志对博古提出批评，集中是在对错误路线的认识方面提出意见。比如说，博古讲：“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那怎么会失败呢？因为敌人力量太强大”。大家认为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敌人力量太强，前几次“围剿”，敌人的力量也不弱呀，从兵力上来讲，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的兵力，我们和敌人比是一比十，同样是这个比例数字，为什么第三次，第四次都取得胜利，第五次就失败了呢？这是很有说服力的驳斥。博古还强调别的理由，说什么外部配合不好，怎么叫外部配合不好呢？就是各个根据地跟中央根据地配合不好，白区工作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配合也不好。总之是强调客观原因吧。外部条件不好，有的同志也补充，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时候全国也这样。因为各个根据地都是各自为战，很难说配合的很好。国民党也不是只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所以，不能过份强调客观上配合不好，不检查自己主观上的错误。这是博古强调的第二个方面。博古强调的第三个方面，是各方的供应不好，所以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家又讲，中央根据地的后方供应做的非常出色的，你要扩大红军，就扩大十万。让李维汉同志扩大三万红军，他一下子就扩大了五万。其他如财政上、粮食和其他物资都是保证供应的，因此，博古所讲的是与事实不符，这只能说明他是在为

其错误作辩解。后来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会上，许多同志在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周恩来在发言中诚恳地表示，我作为军委负责人领导作战失利，带来巨大损失，是有责任的。他说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我建议同志们今后把军事领导权全面委托给毛泽东同志。周恩来的发言对会议影响很大。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同志担任总书记，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全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伟大领袖，这是党成熟的标志。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就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活动，领导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阻截，主动地进行长征，和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暴露了张国焘的阴谋。这段我就不多讲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始是尽量团结。比如说，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给了张国焘，让他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等等。先是耐心的教育，同他的错误作斗争。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党中央也是顾全大局，完成了长征任务。当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的时候，张国焘打过电报。这个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呢，毛主席在延安会议最后请算张国焘错误

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你曾经命令过陈昌浩南下，彻底进行党内斗争，那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另外就是当时的吕黎平的说法有个电报，讲到让四方面军南下，而且要中央红军南下，如果他们不肯南下，就要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执迷不误就要武力解决。这个电报叶剑英拿给毛主席看，当时毛主席立刻召开了中央会议，就是巴西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顾全大局。总不能因为这个问题红军打红军。所以当时中央决定以上山打柴这样一个名义，率领第一、三军团北上，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还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南下了。在这个问题上徐向前同志亦立了很大功劳。当时陈昌浩发现第三军团北上的时候，曾派人去追，实际上是去打。徐向前同志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呢。就制止这件事，最后还是派了一小分队追了一下，遭到彭德怀同志的驳斥，而且劝他们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后来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说服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战士，孤立了张国焘，共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这样红军主力团聚在一起，才使革命转危为安。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我简要讲一下几个方面的线索：

1、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一步一步地向华北逼近。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一方面对日本妥协退让，不作抵抗；另一方面亲临西安指挥东北军、西北军及其嫡系部队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力量。

2、党的“八一”宣言的发表，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陕北站住了脚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样就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比如说对东北军，西北军的争取工作，这方面，现在介绍材料很多，我就不讲了。实际上，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已经同东北军，

西北军订立了停战协议，一个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这时，张、杨二位将军的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认为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张学良将军是不同意反蒋抗日的，他总想逼蒋抗日。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经过延安教堂谈判以后，就把这个会谈经过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党中央决定从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党确定这样一个方针，也做了不少工作。

3、张、杨实行了兵谏，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以后，整个局势显得紧张，而且瞬息万变，不仅震惊国内，而且震动国外。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广大人民拍手称快，要公审人民公敌蒋介石，要杀无赦。东北军，西北军当中，也有的要杀，有的要关有的要放。国民党内部很快就两个阵营分明，亲日派要对东北军，西北军进行讨伐。何应钦轰炸西安的目的就是把蒋介石炸死。炸死蒋何应钦就取而代之。但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要保蒋。但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在国际上，日本当然是利用矛盾，制造更大的内战，便于他进一步侵略。英美还想稳住这个局面，最好是国民党内部要稳住局面，不要发生问题。苏联的态度，总想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来拖住日本，希望日本不要在东方战线对他进攻。这是国际国内形势。简要讲一下。

4、张、杨进行兵谏，我们党是不知道的。有人造谣，说是在我们党的指挥下干的，这是污蔑。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形势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党中央需要有一个分析，各方面的形势，反复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确定正确方针的时间过程。而且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政策亦要相应地发展变化。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一下，因为对西安事变现有各种说法，有的说原来我们想杀了蒋介石，后来共产国际斯大林来了电报，说不准杀，杀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改变方针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应该看到党中央在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分析形势，考虑各种可能性，确定一个正确方针的过程。也可以说，我们党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有个认识过程。蒋介石被抓起来，这是人心大快的事。延安开了大会，要求公审蒋介石，这种口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屠杀了我们多少人？大革命失败以后，到一九

三三年左右，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了两百万人。我们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提出这个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何应钦要发动内战，而且派飞机来轰炸。亲英美派表示谅解的姿态，要求早一点释放蒋介石。东北军、西北军包括张学良的态度，种种情况，我们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考虑，最后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拍来电报，也表示应该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我们党中央考虑了各种形势，各种可能，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一个正确方针。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致国民党的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条方针，指出若能实行，不但国家民族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十二月十九日，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和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指出了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以西北的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统一战线；因此，中央坚决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同志电中指出：我们的策略，应是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5、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按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周恩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西安的群众团体、各界人士、包括党的一些干部对释放蒋介石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和西北军都不赞成轻易放掉蒋介石，有人认为放蒋回南京，无异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有一次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已经把周恩来同志包围起来提出责问，有的已经把手枪掏出来。周恩来同志在这样一个严重的关头，临危不惧，对党的方针作了深刻的分析。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很多军官听了周恩来同志长时间的发言，不仅被周恩来同志所说服，而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以大局为重，不计过去的一切，为了抗日而团结蒋介石。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始和宋子文、宋美龄（还有端纳、戴笠、蒋鼎文）所组成的南京正式代表团举行谈判。宋氏兄妹救蒋心切，虽不免讨价还价，但基本上接